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研究

欧阳静文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教育对于人的素质培养和能力锻炼产生关键性影响, 其中, 大学校长作为教育领域的综合型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 他们的工作成就与其教育背景其密不可分。本文以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现任校长为研究对象, 主要从学科领域、职业背景、性别比例、母校与任职相关度等七大方面进行说明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 分析其对于校长任职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大学校长; 教育背景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 以悉尼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创立和初具规模为标志, 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管理。到目前为止, 分布于澳大利亚各个州的优秀大学有 38 所, 其中有多所世界知名大学。近年来, 著名的三大世界排名对全球各国高校进行综合实力排名, 无论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还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 THE 世界大学排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等已跻身世界大学百强之列。同时, 澳大利亚高校能保持较为平均而且相对世界教育领域而言整体水平比较高的教育质量。造就澳大利亚高水平大学的因素有很多, 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师资队伍建设是其关键所在。

那么, 澳大利亚的知名大学校长们拥有哪些共性和个性特征? 他们的任职需要哪些能力素质标准? 本研究运用 spss21.0 统计软件, 选取了澳大利亚排名前 12 的知名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目的是试图对澳大利亚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情况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内容分析。

一、前言

表 1: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

|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阿德莱德大学 | 1 | 8.3 | 8.3 | 8.3 |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 1 | 8.3 | 8.3 | 16.7 |
| 格里菲斯大学 | 1 | 8.3 | 8.3 | 25.0 |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 1 | 8.3 | 8.3 | 33.3 |
| 昆士兰大学 | 1 | 8.3 | 8.3 | 41.7 |
| 莫纳什大学 | 1 | 8.3 | 8.3 | 50.0 |
| 有效 墨尔本大学 | 1 | 8.3 | 8.3 | 58.3 |
| 塔斯马尼亚大学 | 1 | 8.3 | 8.3 | 66.7 |
| 悉尼大学 | 1 | 8.3 | 8.3 | 75.0 |
| 西澳大利亚大学 | 1 | 8.3 | 8.3 | 83.3 |
| 西悉尼大学 | 1 | 8.3 | 8.3 | 91.7 |
| 新南威尔士大学 | 1 | 8.3 | 8.3 | 100.0 |
| 合计 | 12 | 100.0 | 100.0 | |

澳大利亚公立大学实行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并于 1920 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 通过一系列自愿、合作、协调的活动来共同提高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 并以此来保障大学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大学真正体现“校长治校”的理念, 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和最高行政长官来负责学校的实际运作。

二、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

1、学科领域

| |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有效 | 人文社科 | 9 | 75.0 | 75.0 | 75.0 |
| | 自然科学 | 3 | 25.0 | 25.0 | 100.0 |
| | 合计 | 12 | 100.0 | 100.0 | |

在“学科领域”方面，除了 3 位校长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出身之外，其他 9 位校长的本科学位主要来自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专业，表明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校长以文科学者为主流来源。^{[1] [2] [3] [4]}

虽然校长有自己的学术或职业专长，但是要对一位现代大学校长所处的“学科领域”进行准确归类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文理兼通几乎是担任校长的前提。如果一定要进行学术背景的分类考察，则考察大学校长的本科学位是偏向“人文社科”或者“自然科学”。由统计可得，至少 3 位大学校长的最高学历从“自然科学”转向了“人文社科”，尤其是法学博士。^{[5] [6]}

那么，由表 2 得知在当今的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中，有 75% 的大学由“人文社科”出身者担任校长。^[7] 由于澳大利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多数是综合性大学，因此，该表格显示出澳洲研究型大学的校级行政人员由文科人才主导的基本态势。

2、职业背景

| |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有效 | 学界 | 1 | 8.3 | 8.3 | 8.3 |
| | 政府部门 | 7 | 58.3 | 58.3 | 66.7 |
| | 企业 | 4 | 33.3 | 33.3 | 100.0 |
| | 合计 | 12 | 100.0 | 100.0 | |

在“职业背景”中，澳大利亚有 1 位校长来自学术界（占 12 位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 8.3%），即莫纳什大学校长 Alan Finkel，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后以后，成为了澳洲科学与工程院院士。^[8] 其中有 7 位校长来自政府部门（占 12 位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 58.3%）。剩下的 4 位校长则来自校外的基金会或者企业（占 12 位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 33.3%）。^[9]

由表 3 可得，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主流来源是政府部门，同时，这些曾经在政府机关任职的校长能更好地发挥余热，把有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理念和经验传授给学界。^[10]

3、性别结构

| |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有效 | 男性 | 9 | 75.0 | 75.0 | 75.0 |
| | 女性 | 3 | 25.0 | 25.0 | 100.0 |
| | 合计 | 12 | 100.0 | 100.0 | |

在“性别结构”中，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男女性别比率为 9:3，虽然男性校长占主导地位（占 12 位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 75%），但是女性校长的参与程度也不低，占到了 25% 的比例。

表 4 说明，在澳洲也是男性成为大学校长的主流，不过高等教育的校级行政人员中也有一部分女性的参与。

4、本科学校与最高学历

表 5: 本科学校与最高学历

| | 本科学校 | | 最高学历 | | | |
|----|-------------|-----|------|----------------------|----|-------|
| | 频率 | 百分比 | 频率 | 百分比 | | |
| 有效 | 阿德莱德大学 | 1 | 8.3 | 工商管理硕士 | 1 | 8.3 |
| | 昆士兰大学 | 2 | 16.7 | 哈佛商学院, 西澳大利亚大学法学名誉博士 | 2 | 16.7 |
| | 美国赫尔大学 | 1 | 8.3 | 精神病学硕士 | 1 | 8.3 |
| | 莫纳什大学 | 1 | 8.3 | 昆士兰大学法学名誉博士 | 1 | 8.3 |
| | 墨尔本大学 | 3 | 25.0 | 伦敦大学法学硕士 | 3 | 25.0 |
| | 塔斯马尼亚大学 | 1 | 8.3 | 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 1 | 8.3 |
| | 威尔士大学, 剑桥大学 | 1 | 8.3 | 墨尔本大学核物理博士, 哈佛商学院 | 1 | 8.3 |
| | 悉尼大学 | 1 | 8.3 | 牛津大学 PPE 硕士 | 1 | 8.3 |
| | 西澳大利亚大学 | 1 | 8.3 | 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名誉博士 | 1 | 8.3 |
| | 合计 | 12 | 100 | 合计 | 12 | 100.0 |

由表 5 可以比较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本科学校与最高学历, 从而得出他们的“教育背景”中有一个共同特点是: 至少有一个由澳大利亚授予的学位; 其中产生大学校长最多的是墨尔本大学, 高达 25% 的校长获得过墨尔本大学的学位。另外, 还有 8 位校长曾经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 而且都就读于英美国家的世界名校。^[11]

表 5 说明了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本土化程度非常高, 更熟悉澳洲的学制和教育管理体系。同时, 校长们积极向世界一流大学吸取教育经验, 教育国际化程度高达 66.7%。

5、母校与任职相关度

表 6: 母校与任职相关度

| | | 频率 |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 有效 | 不相关 | 5 | 41.7 | 41.7 | 41.7 |
| | 完全相关 | 7 | 58.3 | 58.3 | 100.0 |
| | 合计 | 12 | 100.0 | 100.0 | |

在“母校与任职相关度”方面, 有 58.3% 的澳洲知名大学校长完全相关, 即他们选择在其本科毕业的母校担任校长。41.7% 大学校长的母校与任职学校存在不相关关系, 即他们没有选择任职于本科毕业的母校。^[12]

由表 6 得知, 超过半数的大学校长回到母校任职。原因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澳洲大学更倾向于选拔有过本校求学经历的校长候选人, 因为他们更了解本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行政管理体系。第二,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母校情结”比较深, 他们受过特有的校园组织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第三, 回到母校担任校长, 能更好地把校长的社会资源和学校资源整合起来, 有助于减缓新校长开展工作时的阻力。

6、年龄结构

表 7: 出生年月的描述统计量

| | N | 全距 | 极小值 | 极大值 | 均值 | 标准差 |
|-------|----|----|------|------|---------|-------|
| 出生年 | 12 | 19 | 1930 | 1949 | 1941.92 | 7.077 |
| 有效的 N | 12 | | | | | |

表 8: 上任年龄的描述统计量

| | N | 全距 | 极小值 | 极大值 | 均值 | 标准差 |
|-------|----|----|-----|-----|-------|-------|
| 上任年龄 | 12 | 19 | 58 | 77 | 65.69 | 6.395 |
| 有效的 N | 12 | | | | | |

在“出生年月”方面，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年龄跨度比较大。校长的平均出生年龄是 1942 年，截至 2013 年的任期，校长的平均年龄约为 71 岁。极大值为 1930 年，悉尼大学校长 Marie Bashir 的年龄是 83 岁；极小值为 1949 年，莫纳什大学校长 Alan Finkel 的年龄是 64 岁。

在“上任年龄”方面，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任职年龄也很高。校长的平均上任年龄是 66 岁，其中极大值为悉尼大学校长 Marie Bashir，就任年龄 77 岁；极小值为昆士兰大学校长 Llewellyn Edwards，就任年龄 58 岁。^[13]

由表 7 可以看出，澳洲大学校长的年龄层次非常高，平均上任年龄为 66 岁，说明澳大利亚的校长老龄化程度很高，但是他们所积累的学术成就和社会经验相应地比较深厚，可能澳洲知名大学更倾向于选拔智囊型校长。

7、在任时间

表 9: 在任时间

| | 频率 | 百分比 | 均值 | 5.08 |
|----|----|-------|----|------|
| | 1 | 8.3 | 中值 | 3.00 |
| | 2 | 33.3 | | |
| | 3 | 16.7 | | |
| 有效 | 6 | 16.7 | | |
| | 7 | 8.3 | 众数 | 2 |
| | 11 | 8.3 | | |
| | 16 | 8.3 | | |
| 合计 | 12 | 100.0 | | |

由表 7 可知，在“在任时间”方面，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校长任期并不固定，平均在任时间是 5 年，中值是 3 年，众数是 2 年。其中，任职校长时间最长的为昆士兰大学校长 Llewellyn Edwards，在任 16 年，为该学校的长远发展制定了持续性和连贯性的政策。在任时间最短的是塔斯马尼亚大学 Michael Field，在任 1 年，2012 年才经历校长换届选举。

三、对我国完善校长选拔制度的启示

1、校长聘任资格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共同特征。综合 12 所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来看，选聘校长其基本条件是：在澳大利亚一流大学接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一般具有硕士学位；校长候选者具有出色的管理能力等。澳大利亚大学校长聘任在坚持高标准的同时，对不同学科领域、职业背景和年龄结构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

2、主流来源是政府部门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主流来源是政府部门，占 12 位澳洲知名大学校长的 58.3%。还有两位校长曾任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昆士兰州州长。对比我国，也有许多政府官员成为了大学校长。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大学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的公共服务功能的逐步扩大，所面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还需要妥善处理与政府、企业、社区、校友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大学校长选拔中、官员到高校任职的现象多次出现。^[14]

3、学历与能力并重

大学校长的学历与知识水平成正相关关系,经历过博士阶段严格的科研训练的学者,往往更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独立的思维能力。但是澳大利亚知名大学在选拔校长时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推行学历至上主义,而是学历与能力并重。^[15]例如,悉尼大学的女校长 Marie Bashir 只有精神病学硕士学位,但是她长年深入工作在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服务于圣文森特医院、皇家亚历山德拉儿童医院、中央悉尼地区健康卫生社区等地,在卸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之后,从 2007 年至今担任悉尼大学校长。所以澳大利亚的知名大学更注重校长的实践经历和综合素质。

4、教育背景的多样化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的个人教育背景,包括知识结构和受教育地点的多样化。从知识结构上分析,33.3%的校长本科阶段研究“自然科学”,其最高学历转向了“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法学博士,因此培养了文理兼备、交叉研究的复合型人才。从受教育地点来分析,他们一般都毕业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学校,66.6%的校长曾经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而且都就读于世界一流名校,如哈佛商学院。不同的受教育环境赋予他们开阔的眼界和开明的思想,也有利于养成他们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他们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校长教育背景的多元化与大学校长的开明程度成正关关系。

5、学科领域的人文背景凸显

很多澳洲大学校长拥有不同方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科结构比较丰富,人文学术背景凸显。对比我国的校长学科领域,我国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建设,在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和总体素质、能力、水平上都不断得到改善和提升。^[15]但是我国对理工科背景的人才担任大学校长有着特殊的偏好,大学校长多是理工科出身。

因此,在我国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校长有助于改善大学偏科发展的倾向,可以使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更加多元化、多样化。借鉴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教育教学能力、科学研究能力、职业道德素养,为我国大学选拔高水平的校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6、年龄结构的老龄化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的校长平均上任年龄为 66 岁,年龄层次较高。一方面,年龄大的校长更富有个人才智和社会经验,该年龄段的任职者都已具有丰富的管理经历以及杰出的个人成就;另一方面,他们因为热爱教育事业、乐于传道授业才选择担任校长之职,在制定大学的长远发展规划上更有远见,善于整合学校资源和社会资源。

同时,老龄化的校长结构也存在一定的隐患,例如校长的任期无法制定得很长,从而无法确保大学体制建设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我国大学在选拔校长时也应当考虑年龄结构均衡化,既有智囊型年龄层次偏高的校长,也有富于高等教育改革精神的年轻校长。此外,在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澳大利亚大学越来越重视网罗、集聚优秀人才的前瞻性招聘。^[16]

7、“母校色彩”趋于平淡

澳大利亚知名大学所选择校长的“母校色彩”已经趋于平淡,但校长是否具有任职学校的“教育背景”或“职业背景”是能否任职该大学的一个重要考量。总体而言,澳洲研究型大学校长倾向于外部选拔模式。

对比我国在选派大学校长时,大多倾向于选择具有该校就读经历的人任该校校长,例如在我国 211 工程大学中,约有 60%的校长是现在任职学校的校友,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容易造成校长的视野狭隘,墨守成规,难以带领学校实现突破性的教育改革创新。^[17]当今国外知名大学中校长的本校血统已趋于平淡,而在我国仍然相当浓厚。因此,要积极吸纳外校毕业生到本校工作,从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校长。

参考文献

- [1] <http://www.adm.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2] <http://www.adm.Sydney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3] <http://www.adm.Melbourne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4] <http://www.adm.Queensland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5] <http://www.adm.Adelaide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6] <http://www.adm.unsw.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7] <http://www.adm.WesternAustralia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8] <http://www.adm.monash.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9] <http://www.adm.rmit.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10] <http://www.adm.Tasmania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11] <http://www.adm.GriffithUniversity.edu.au/-development/z.html>
[12] <http://www.adm.WesternSydneyUniversity.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13] <http://www.adm.monash.edu.au/staff-development/z.html>
[14] 许迈进. 澳大利亚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特點与启示[J]. 世界教育信息, 2003, (2).
[15] 杜利平. 教学: 高校教师的首要学术责任[J].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1).
[16] 吴坚. 从国外知名大学校长的素质看教育背景在大学校长选拔中的影响[J]. 高教教育研究, 2010, (7).
[17] 蓝劲松. 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之学术背景[J]. 中国高教研究, 2004, (12).

A study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the president of a well-known Australian university

Ouyang Jingwe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key factor during the period of formatting people's personality and ability. Therefore, the President of every university serves as a comprehensive talent and outstanding administrator; their accomplishments are inseparably linking with their education background.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Australian president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comparing mainly from their research area,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gender ratio, Alma mater and served university and other aspects, such as correlation for Australian famous university Presidents' academic backgrou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its role for the president of a well-known Australian university.

Keywords: a well-known Australian university president education background